

在中国古代哲学中,一方面,“宽窄”多表现为事物由低向高的转化之中,当发展到了极点,必然陷入“物极必反”的境地。另一方面,“宽窄”是表述事物运动变化的评价符号,宽窄相济就是对立统一。

当“宽窄”遇见中国古代哲学

■ 郭少飞



祖来沟通上帝与人间。其中,占卜是祭祀的重要手段,烧灼后的龟壳或兽骨的裂纹宽窄是预测吉祥祸福的评价标准。直到周朝之时,周公且指出:“天命靡常”,统治者只有讲究“德”、“孝”,注意统治的技巧与方法,“保民”才能保住自己的统治地位。

宽窄之道在于天人合一。“道”的开始在于宇宙的没有任何规定性的实质,是世界统一性的认识。这种原始性的“道”表现在封建社会的内容上,就是道统、天志、性理等。代表如孟子云:莫非天命,顺受其正。具体来说,封建国家的政权更迭,不变的是“天道”,是政治秩序的继承。

宽窄的境界在于忘记宽窄,做到“无己”。这主要是指庄子的虚无主义主张,讲究取消万事万物的是非差别,追求个人精神的绝对自由。人的天然本性就是将心的效用发挥到极致,“坐忘”于天地。自然的本性是无知无觉的,得“道”就是人与自然化为“一”。这实际上否定了事物存在的客观实在性,以主观精神作为区分事物的标准。总体来说,古人的宽窄之“道”是现代人类追求精神世界的先导,有自己的可取之处,但也存在认识的误区。

在古代社会关系中,首先,道德伦理是进行社会分层的基础,第一是社会组织中上下级之间的伦理结构,包括君臣关系的上下、宗法组织上的管理、学业上的师承等。第二是社会交往中的长幼尊卑的伦理结构,包括年龄大小、地位尊卑、经济贫富、知识多寡、智识多少、道德善恶、能力强弱、智力智愚等。正是这些构成了古代人民活动范围的宽窄,决定了社会领域的成熟程度。

其次,宽窄是万物交往的参照轴。在古人的认知中,物理空间的宽窄是可感知的符号,是古人表述“天人”、“民胞物与”、形神问题、心物关系的语境话语。

“宽窄”是人进行自我完善的价值标准

“理”在“性”先还是“性”在“理”先,这是古人关于道德哲学的中心命题。古人哲学在关于道德的相关论述中,尤其强调以自我为统帅,进而实现天下大治。

以“仁”为例,孔子渴望“天下有道”,想通过克己复礼为仁。一是君臣之间,把握的原则就是“上好礼”“贤者”“尊之以德”“齐之以礼”的原则,礼治德化方能上下同心。二是人与人之间,“礼”是社会要具备的道德准则,“人而不仁,如礼何”。在处理社会关系时,宽窄的界限就是不要以自我为中心,拒绝主观猜测,拒绝固执己见、拒绝不留余地。三是对于个人而言,礼的宽窄就在于准确把握礼的性质与内容,不断约束自己使其合乎礼的规范,做到恭、宽、信、敏、惠,成为君子。其次,“仁”是自发性的、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,“我欲仁,斯仁至矣”。墨子则认为“兼爱”就是仁义,是以利人为核心内容。朱熹继承与发展了孔子关于“仁”的观点,强调天命之性如日,光芒四射,无显弗达,没有偏害;气象各不相同,正如间隙分长短、大小或宽窄一样。因此,宽窄是“仁”的标准,是层次性、范围性的立体统一。不可否认,“仁”的先验性是孔子思想的核心,就是说假定“自己”的心都是善良的。

在人的自我发展中,空间审美必不可

少。例如建筑空间中,在大的方面,空间分割的宽窄是园林美学的原则,要显示出格局、灵性与自然;在个体方面,门窗的宽窄及各式体裁都讲究交相更替,即使在同一屋之内,各部分也是异彩纷呈;在自然与建筑的空间转换中,这种耳目一新之感更为强烈。在绘画艺术中,古人讲究利用空间的大小、方向、疏密、宽窄、图与底的搭配以及色彩的浓淡等,展现视觉感的内容多元性,表达出情感变化、语言多姿、思想深邃的气息。

“宽窄”是朴素辩证法的基础

物质世界是无限与有限的统一,从宇宙本身来讲,时间是无限的,具体到每一事物身上,时间却是有限的。在中国古代哲学中,一方面,“宽窄”多表现为事物由低向高的转化之中,当发展到了极点,必然陷入“物极必反”的境地。老子云:“反者,道之动”,即事物的规律都是向着它的反面发展;可以说,“宽窄”不仅是发展的往复对立的表现,而且是朴素辩证法思想的表达。古人在观察天文气象、时节变化的过程中,总结出了“时不至不可强生,事不究不可强成”的人与自然关系。客观上,这将从

“天”、“神”等权威下解放出来,塑造了中国人自强不息的性格。

另一方面,“宽窄”是表述事物运动变化的评价符号,宽窄相济就是对立统一。在对立性上,形容事物状态的东、南、西、北、前、后、左、右以及长短、高矮、宽窄等都有这样的相对性。在统一性上,“宽窄”具有“和”、“同”、“大同”概念的意义,“有无相生、难易相成,长短相形,高下相倾,音声相和,前后相随”,这就是宽窄的各种表现形式,是对立双方相互转化的辩证统一。在社会实践中,我们要讲究“形胜之变,与天地相蔽而不穷”,灵活采用各种方式方法适应不断变化的客观实际。

“宽窄”哲学的背后其实是中国古代经济的发展,是自然与人文的相互交织,是现代社标准逐步建立的过程。封建统治阶级依据“宽窄”建立自己的等级制度,古代劳动人民通过“宽窄”来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,这些都从而完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秩序构建。一言以蔽之,“宽窄”既源于历史,又超越于历史,是中国哲学的典型话语。(作者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)



圣人传道,道的力量是神秘和强大的

“宽窄”是天地之中的“道”

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孕育于中国古代人对社会实践的认识。上古时代,天命之道巫、祝、史等掌握,他们通过祭祀

宽窄治理观:严苛与宽厚

从来在国家治理中都会碰到“宽”和“窄”的疑问,统治者严刑峻法、与民争利肯定是“严”,修养生息、仁民厚物,就是“宽”。历史上经常听到什么“文武之道一张一弛”“宽猛相济”等话语,似乎大家都知道不能一味地宽,也不能长时期地严,要看形势,该宽则宽,该严一定要严。但实际上在传统社会里,权势人物都是倾向于严于治国的,当其大权在握、生杀予夺之际,从来都不管黎民的死活,弄得怨声载道、哀鸿遍野,尤然歌舞升平、醉生梦死。帝王将相们只是把宽窄理解成“术”和“势”,并无真正的民本和人本思想。

宽窄说

在传统社会中,如何管理百姓可能是所有当官者最头疼的事情,千百年来都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,对此中外皆有一个贴切比喻,就是把百姓比作“羊群”,羊群要主人来放牧,牧羊人当然喜欢温顺的羊儿,羊的习性确实温顺而又喜欢结群,主人总是想方设法让羊儿既肥壮又听话,但是一个群体里面总有调皮捣蛋的家伙,所以“牧羊人”始终都在寻求更好的方式和策略。就如养猴子的,当“明正典刑”遭到猴群的反对,他挽救了朝四暮三,总量根本没变,但哄得猴儿们高兴不造反就行。这形象地说明了统治者的驾驭之术完全是“一门艺术”,所以古代的御者地位是蛮高的。我们经常说“一颗老鼠屎坏一锅汤”,还要“惩”“言粉之马”,可能确有难言之隐。对一群乌合之众,我们讲究的是“射人先射马,擒贼先擒王”,抓住了造反者是“首恶必办”,绝不宽宥。

当社会人群分为劳心者和劳力者,君子和小人、官与民,往往前者就被赋予了历史

的重任,因为历史本就是由他们书写的,所以似乎历史也理所当然地由他们推动。还是我们的大成至圣先师一语中的:“劳心者治人,劳力者治于人。”主导与被动赫然分明,后者沦为“治理”的对象,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,“宽严”成了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一个基本范畴,正如我们说“文武之道,一张一弛”,“张弛”也同样是皇权政治所研究的“治世之道”,宽严仁厚与严苛峻急,是相反为用,政发由心,甚至一念之间。劳心者认为可以松点或紧点,重一点或轻一点,宽一点或严一点,是可自由选择的,虽然按圣人的高标准来说,必须根据具体形势相应地采取统治策略,这叫“审势”,但是具体的历史中,总是以统治者采取高压政策为主,该宽的绝不肯宽,不该严的却偏偏要严。劳心者与劳力者处于对立面,而百姓又是沉默的大多数,宽严的裁量使用掌握在权势者手上,所以跟百姓的意愿和意志无关。

所以,在传统帝王之术的概念里,虽然

从黎民的角度看,实际上是有严无宽,但从劳心者的视角来说,还是有严有宽、宽严相济的,当看到自己的统治基础不稳,需要笼络人心的时候,就会轻徭薄赋,一旦他觉得稳定了天下,高枕无忧了,立马会敲骨吸髓,竭泽而渔。可以看出,即使采取宽松政策,也不过是放水养鱼而已,他们并非真正以民为本。即便那个时代也提出了“君轻民贵”的口号,本质上还是其统治策略而已,因此所谓“宽严”是相对的概念,他对百姓虽“宽”,并不等于给予同等的生存空间,永远是他的宽、你的窄。诸葛亮也好,赵奢也好,他们所掌握的“宽严”这个话语权力,不是跟百姓协商的结果,可能老百姓已经觉得“严”到活不下去了,没有一点生存空间了,但他们却认为还“宽”得很。这就是宽严的相对性。

再说宽严的辩证性。有什么样的史观就有什么样的历史。一部二十四史,虽汗牛充栋,无非是帝王家史,一页一页发黄的纸张,里面记载的无非是帝王将相、英雄好汉纵横驰骋的故事,基本没有小百姓的位置。《狂人日记》中写道:“我翻开历史一查,这历史没有年代,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‘仁义道德’几个字。我横竖睡不着,仔细看了半夜,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,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‘吃人’。”在这里,帝王将相就等于仁义道德的,狂人不采取常人的视角,不看主流意识形态,于是在狭窄的字缝里发现了历史的真相:百姓被官史所遮蔽、掩盖,无声无息,他们因此无法跻身于历史,也可以说是被这样

的历史所杀,故此这个历史就是吃人的历史。因为史书为大众所留的位置太狭窄,甚至完全被遮蔽而看不见。

可以看出,给自己放着很宽的尺度,逼迫他在社会生活中走钢丝,宽于待己,严于律人,所谓州官可以放火,百姓不许点灯,人都说“大路朝天,各走半边”,从法理讲人人皆享有此一路线,他却认为这条大路该自己独占。始皇帝没有给陈胜等人留下活路,结局当然是把好汉逼上梁山、铤而走险,当陈胜发现路都给官家占据了,他只有死路一条,没办法,也只有拼死一搏。历史上,每当一个王朝出现强盗,占山为王,声称“此山是我开,此树是我栽”的时候,就已经处于危机时刻了。秦始皇一统天下后,曾广修道路,达到了条条大路到长安的程度,但是这些路只是给自己修的,皇家道路的延伸是要将皇帝的权力延伸下去,哪里有反抗即可将其武装力量快速递送过去,这是他统治天下的硬实力,所谓“扶杖朴而鞭笞天下”,他修路不是为了百姓致富,其结果是天下无路可走者皆揭竿而起,阻绝其道路,皇帝后来发现自己原本宽阔的道路越来越狭窄了,最后竟是自己走投无路。

传统所谓帝王之术,都是表面讲的是儒家,实际行的是法家,儒家最大的教义是在“仁”之字,说是“仁者爱人”或者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”,要给别人留下空间,留下选择的余地,宽以待人。法家讲的是法、术、势,是完全的“道”,只要一旦得势,绝无半点宽容之心,以控制人、以术欺人、以势压人,自以为天纵英豪,纵横天

下,完全不给别人“活路”。往往在王朝初期,开山祖宗们压起自民间,尚能体谅民间疾苦,行修养生息之政,甚至给百姓“修桥补路”,但到了王朝末期,王子们都是生于深宫之中,长于妇人之手,从小锦衣玉食,骄纵奢豪,忘记了先人的训戒,所以即使真正坐上了龙椅,也发现并没有走上金光大道,很快面临改朝换代的命运。

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儒释道三教,其中儒家与法家同流合污,为历代野心家、阴谋家提供着理论和方法,似乎很管用,那些鬼魅们都吃这一套。道家看出其偏颇,故意来个反其道而行之,但制不了儒法合璧的阴阳剑,中华历史沉陷于恶性轮回中。其实佛家的教义还真是一副对症的方剂,首先,佛家不但目中有人,而且目中还有物,在佛的眼里,人类当然自有其生存的空间,但万物皆有各自的空间,所谓“蝼蚁尚且偷生”,它的教义正为孟子都留下生存权,“不杀生”这个戒律的真谛,即是尊重其他生命形式,就如人行于山间小路,虽道路狭窄仅可容足,若遇小虫了也恰好路过了,你也应尊重它的“路权”和生命权,你虽有那个力去踩死一只虫子,却没有那个权去剥夺一个生命——这视界何等开阔!禅师说:去年贫,未是贫;今年贫,始是贫。去年贫,我有立锥之地;今年贫,锥也无。这段公案实际上体现了佛家的一种伟大谦逊,这种谦逊体现为深刻的人观和深邃的哲理。(本文摘自光明日报出版社《宽窄九章——写给大众的哲学》一书中第九章《宽窄启示录》之第三节《宽窄治理观:严苛与宽厚》一文,有删节)



秦始皇一统天下后广修道路